

治
學
八
言



千帆
程
著
社
齐鲁书

治学小言

程千帆 著

齐鲁书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治学小言

程千帆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787×1092毫米36开本 $4\frac{2}{9}$ 印张 4 插页 69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10206·152 定价 0.95元

千帆先生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创作激情奋发，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好几本书。这本是先生治学方法之谈。作为老一辈学者漫步学林之路的记录，实可以使后学者扩大这方面的视野。不管什么经验，当然不能照搬，学者自身成长的道路，也是千差百殊，千帆先生愿将个人的经验及见解奉献于世，当然是好事。这里所包含的，都是作者在学术道路上跋涉的苦辛，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对未来的探望；对有志于“方法论”的学者，是可以提供多方面的感性知识的。以上浅薄之见，是否有当，尚望先生鉴察，并以此奉饷读者，作为序言。

王仲萃

目 次

序	王仲莘 (1)
关于治学方法	(1)
治学要重视解决矛盾	(28)
从迷雾中走出来	(31)
詹詹录	(40)
关于知识爆炸与基本功的对话	(47)
答《江海学刊》问治学经验	(53)
治学不可囿于狭义概念	(57)
谈谈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	(62)
关于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建立教师梯队的 若干问题	(71)
附：对中文系博士生培养情况的意见	莫砺锋 (78)
在探索中前进	(81)
对文科教育的几点看法	(90)
教学、科研密切结合，促进教材建设	(96)

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些意见	(104)
开展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两个问题 (113)		
答《文学遗产》问古代文学研究现状	(117)
答人问治诗	(121)
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五点意见	(126)
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	(130)
《史通》读法	(135)
后记	陶 芸 (143)

关于治学方法

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研究生的一次谈话

如何治学，具体地说，如何研究古典文学，事实上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从大量的事实抽象出几点来谈一谈，还必须考虑到所抽象的事实本身。这也就是说，假若我们抽象出若干条来，这若干条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们应该是从我们当前学术界的现状，从学术界的成绩和缺点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如果不分析这样一些具体的现状，那我们谈方法，也可以说是缺乏针对性。所以，我不能不稍为涉及一下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方面的情况。

—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最近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一些情况。总的来说，这三十年有巨大的成绩，也有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讲成绩的话，就我个人思考，有那么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点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工农兵翻了身，当了社会的主人，开始有条件分享我们祖国几千年来非常优秀的文学遗产。为工农兵服务，在古典文学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使一般稍有点文化的同志们，能够念古典小说、古典诗歌，能够看古代戏剧。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也许有些同志专心研究那些高深的学术去了，没有注意这点。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那的确是个了不起。列宁论托尔斯泰，说托尔斯泰的著作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是他随即就谈到，要真正使托尔斯泰的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品，为俄国的普通人民所占有，那就要使人民有机会同愚昧、无知作斗争，就是说要提高普通人民的文化程度。他说，那就首先要有一个革命。这是列宁当时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实现了。在我们中国来说，现在也大体上实现了。这可以说是一种丰功伟绩。

第二点，这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我们开始注意到打破中国文学史是汉语、汉族文学史这样一个单一的局面。我们开始注意到发掘、整理、出版兄弟民族的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汉族与兄弟民族这几千年互相斗争又相互融合，最后形成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包括文学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在党的教育之下，我们开始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无论写作方面，还是出版方面，我们都许多优秀的成果。就从出版方面来讲吧，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些难看得到的材料，现在都很容易看到。比如说《册府元龟》这样一部书，在以前就只有一种明版，我们现在把它影印出来了，谁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又比如说《永乐大典》，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被帝国主义的军队焚烧、破坏以后，散在全国、全世界，现在把所有残存的本子都拍了照片，影印出来。全国的学者，利用这个材料，做了很多工作。

除了古籍整理以外，我们还出版了好些专著和论文，有许多是老一辈的学者，在旧社会已经开始动手的，只是到了新社会，才有更好的条件来完成。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一辈写的，比如说，解放初期还是青少年，这几十年才成长起来的。我们有许多专著或者论文，本身材料很充分，而且从观点来说，就我个人的水平来看，我觉得是符合于马列主义观点的。举例来说，何其芳同志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些论文，以及王朝闻谈古典美学或古代戏剧的一些论文，水平是相当高的。

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短短三十年，就取得了这样一些成绩，很值得自豪。

可是，与此同时，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拖累了我

们，使我们不能够大踏步前进。

很久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建国以来一直不断地有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就政治本身来说，大多数都是必要的，当然，有时候，在个别情况下，或许扩大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当这些运动牵涉到学术问题时，往往不能够很好地把二者分开。最近一两年来，文学界也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们各抒己见，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我个人看来，学术同政治是难以绝对分开的。列宁讲得很清楚，“统治阶级的观点，就是统治的观点”，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从这个意义来说，政治同学术不能分开。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学术同政治究竟还是两回事。处理学术问题，不能用政治方法。如果混为一谈，把问题简单化了，就不仅对学术不利，对政治也不利。因为不断有政治运动，做学问的人，某一种学术计划，也往往受到这个政治运动的影响。因此，工作的持续性很差。我们不知道订过多少计划，但是很少完成一个计划。工作的持续性不能够保持，是我们在科学的研究上，不能出比较巨大的成果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我国过去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们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从“四人帮”被打倒、消灭以后，我们

总结这一段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封建思想还很严重，这不是说哪一个人要维护封建主义的问题，而是说这样巨大的一个历史包袱驮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分担了一份。封建社会里政府提倡的学术，就是经学。经学，有一个最高的、不能改变的、或者是不能批评的原理，那就是孔孟之道。所以，后来人讲经学的话，就是“疏不破注，注不破经”，做注子只能够照着那个经来解释，不能够去破它，就是不能反驳它。那个注子比较古，难得懂，就又做疏。疏呢，又不能破注子。即使是后代的某一些学者，提出新的解释，那也是要在尊经的外衣之下进行。比如说，宋儒讲经，同汉朝已经不一样，但是，它不敢否认孔孟之道。清朝的唯物主义学者戴东原，做《〈孟子〉字义疏证》以反驳宋儒，表面上，这个外衣他也还是要披上的。这同欧洲的中世纪进行某些革新，一定要附会基督教的教义一样。这种情况之下，使我们每个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至少我个人是如此，我不晓得别人怎样——就用一种经学的方法去学习，就是把它当成一种非常值得尊敬、不能够怀疑，也不能够发展的東西来学习。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研究古典文学，或者研究文艺理论，往往不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认真探索和阐明某个作品的思想性或

者艺术性的本质，而是反过来利用某些材料，证明马列主义是正确的。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是这样。所以，结果我们的研究论著，有的人说，只成了马、恩、列、斯、毛，再加上高尔基、鲁迅，七家之说的互相证明。这样就使我们的学术很难发展。其实列宁和毛主席都讲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只能够指导，而不能代替其他的科学。而我们往往只要所做的工作，能够利用材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或者写一篇文章，加上列宁怎么教导说，马克思怎么教导说，而我这个论点则是与之相合的，就满足了。所以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学术，并不能够真正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向前发展。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脑子里有一种封建思想。这种封建思想，在学术上，就是把一切其他的学术当成经学的奴仆。治学、做学问，就是要创新。而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之下会怎么样呢，就变成我们工地上的施工一样，写个大标语：“安全第一”！做学问不是要去求得新的成果，而是要安全，不挨批判。我们要真正做到思想解放，要有一个过程，一个实践的过程。当然，这也要靠我们自我摆脱经学的重压，才有可能使学术前进。

我们刚才谈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所以，我第三点就想讲一讲，事实上我们没学好。用最通俗的解释（当然现在哲学界也有不同看

法，我还是认为这样一种通俗解释是好的），什么叫做辩证呢，就是一分为二。什么叫做唯物呢，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解释简单明了。可是我们实际上做事情，就没能够很好地真正一分为二，实事求是。批评一个人，一拥而上，只要或者党报，或者某一个理论权威点了一下，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或是暗示一下，底下那个队伍，可就浩浩荡荡了，大家都来批评，争先恐后。有没有人支持被批评的人呢？有，既不是大字报，又不是小字报，是无声报。他背后讲：“这个批评不对，我有意见”，但请他做个报告、写篇文章吧，他不干。这是由于整个的社會上的一种压力。这种情况到了近年来“四人帮”的时候更厉害了，这事实上就不是一分为二。

再说大学课程安排问题。我们经过几次课程表的改革，那些课程表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苏联的教育思想，我没有什么研究，但是我看它那倾向性，是希望造就一种面儿比较窄的专家。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的毕业成绩表上，填学的专业，毕业以后就成为什么专家。就拿我们中文系来说吧，它就把那些许多必需要的基础科学，边缘科学，都取消了，把课程并成几个大块。比如把文学史安排每周六小时，学四年，把各种作品的选读、作家研究，什么东西都塞了进去。一些辅助科学，象我现在讲的校

文学，或者历史地理，或者工具书使用法，乃至于中国文学的一些背景研究，如中国文化史、思想史，这些课都没有了。所以同志们学出来之后，面儿很窄，吃的那么几大块，而且概念性的东西接受得多，具体作品念得少。要谈些什么人民性哪，现实性哪，或者典型问题啊，或者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啊，可以谈得头头是道，可是，要把这些概念，都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上去，就感到为难。甚至于写过很多关于某一方面文章的同志，对于那方面的作品本身却并没有花过很大的功夫来钻研，因为根据几个概念，再加上几个例子，也就可以构成一篇文章了。无论是只追求“专”，而忽视“通”，或只务“虚”而不务“实”，即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都是不符合一分为二的精神的，是不行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班固《汉书》上的话，现在看起来，很有道理。不实事求是，就认为在业务上或是其它方面，可以违反自然规律，单凭着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创造出奇迹来。结果往往不是这样。记得五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批判过胡适的“实用主义”。胡适的名言就是，真理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你要把她怎样打扮，就怎么打扮。我们批判过这个东西。可是，在过去的一些年代里，我们的某种做法，简

直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一亩稻子可以产十三万斤的粮食”啰，还有就是什么“三结合”搞大规模的科学协作啰，动用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结果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文化建设方面，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得出成果来。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即使是非常有地位的学者，也会做出很不恰当的事情来。如果不嫌冒昧的话，我想举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这本书做例子。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出版的唯一古典文学专著。但是这一本书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奇妙的。一方面，出了平装，又出精装，《人民画报》还用大量的画幅介绍；另外一方面，全国所有的读者，对这一本书保持缄默，大家不开口。这很简单：大家不满意这本书，但是又不能批评。一直到郭老过世以后，萧涤非先生才写了一篇文章。萧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而且态度非常好。郭沫若那本书，我就不重复介绍它的内容了，反正整个来说，它的那些叙述和论证都是非常古怪的。比如，李白他想看湘江，看洞庭湖，洞庭湖里有一个君山，这个君山遮了眼睛。李白说，最好儿铲子把它铲掉，这样就看得广阔一些。可是郭老忽发奇想，说李白很关心农民，把君山铲过以后，可以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可以种谷子多酿酒，多收入。这简直把君山变成大寨的虎头山了。又讲，“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这个杜甫，你看，眼睛就望着“寒士”，可见立场不稳！杜甫，当然立场不稳！但也可以说，他的立场是“坚定”，不是“不稳”——他牢牢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可是，杜甫另外也有诗说：“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这个“苍生”，难道也是“寒士”？不仅如此，而且，那本书的写作态度特别坏。他批评冯至啊，萧涤非啊，傅庚生啊，国内这些讲杜诗学的学者，不是说“这些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对于杜甫现存的诗文，是否全体通读过，实在是一个疑问”，就是说某些研究家们的眼睛里生了“白内障”。郭老很文雅，实际上就是说，你瞎了眼！这，不象话啊！为什么以郭老这样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很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很有学术地位的人，会写出这样的书呢？又为什么写出来之后，在他活着的时候，全国一声不吭？难道不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吗？对郭先生，我还是很尊敬的，我没有意思要攻击他，我只是谈这个事实。而且，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问题。所以我感觉到，象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够用我们的实践，在中央的正确政策指导之下打破现状，我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学习，就很难有进展。而打破这种局面，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责任。

二

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近二三十年来的情况，着重的是讲里面有些问题。以下，就想针对我所认识的这样一些情况，谈谈治学方法，或是科学的研究的几个方面：

第一，讲科学的研究的意义。究竟什么叫科学的研究，我想，就是从现在已经有的研究成果，向前发展。如果没有发展，那就不能叫做研究。我们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之内，先了解哪些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哪些是解决了一部分，还在继续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完全还没有接触的问题；我们使用了哪样一些方法；哪些方法我们还没有用过。总的来说，就是要对于前人的业绩批判继承，因此必须要对当前你那一个行当的学术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最好是了解得比较详细。这样，你的工作——我指的是研究工作，不是一般的学习——才会有出发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在你的脑筋里面，就应该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人的名单，还应该有一个更长的书单和论文的单子。假定说你是搞训诂学，对于清朝那些大师们写的有关《尔雅》、《广雅》的书，当然不成问题应该熟悉。从那些人以后，近代和当代的学者，哪一个人，他搞什么，写过些什么文章，如果你真正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心里就得有个